

# 论克什克腾旗喜鹊沟铜矿遗址及相关问题

王立新 付琳

关键词：喜鹊沟铜矿遗址 晚商时期 季节性聚落

KEYWORDS: Xiquegou Copper Mine Site Late Shang Dynasty Seasonal Settlements

ABSTRACT: Among the popular pottery artifacts unearthed at Xiquegou Copper Mine Site, a kind of *li*-cauldron with high neck, bulging belly and lobed rim is generally believed to belong to the late Shang Dynasty. Xiquegou Copper Mine Site is the earliest mining site found to the north of Yangtze River to date; seen from the surrounding ecologic environment, terrain and the pattern of the residential remains, Xiquegou Site could not be a settlement with permanent residents, but a seasonal settlement for the mining activity; the food resources of the residents, or the miners, were animal husbandry or fishing and hunting. The discovery of this mining site provided important clues for the explorations on the copper and tin resources of the bronze metallurgy in the Central Plains during the late Shang Dynasty.

2011年发掘的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喜鹊沟遗址是迄今为止我国长江以北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铜矿遗址，具有独特的聚落特点和生产方式。对此遗址的发掘，不仅丰富了对本地区晚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的认识，更使我们了解到这一时期土著人群对当地铜、锡矿产资源的开发情况，为深入研究本地区早期青铜时代的文化、生业与技术等提供了一批珍贵的资料。

## 一、文化性质与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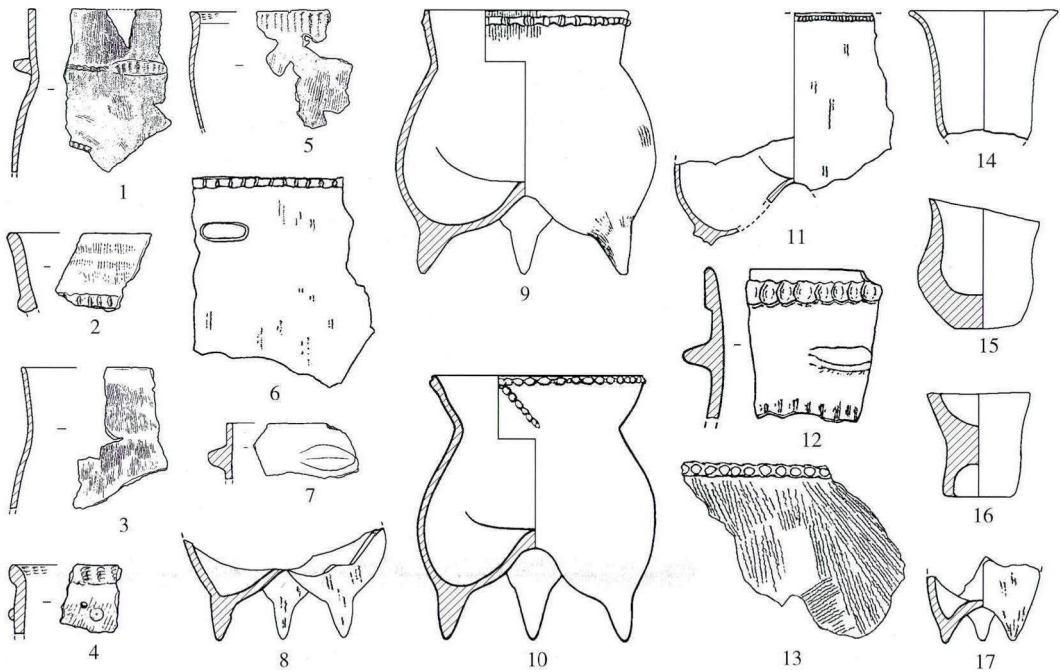
喜鹊沟遗址出土陶器中，夹砂灰褐陶占全部陶片的75%以上，夹砂红褐陶约占20%。陶器中饰绳纹者占80%以上，素面者不到10%。部分绳纹比较模糊，也见少量先施绳纹再局部抹平者。遗址出土的大量陶片中，可辨器类以鬲为大宗，另有少量的罐和

盆。陶鬲的口沿上端或颈部常见一周附加堆纹，且常在颈部加装鸡冠形鏊<sup>[1]</sup>。

与喜鹊沟遗址陶器特征相似的遗存见于赤峰市松山区砚台山遗址B2区。该遗址是一处小型居住址，从出土陶片看，可辨器类有鬲、甗、尊形器、盅、陶拍、纺轮等<sup>[2]</sup>。以往在林西锅撑子山<sup>[3]</sup>、克什克腾旗天宝同<sup>[4]</sup>、巴林右旗古日古勒台<sup>[5]</sup>也曾采集到风格类似的遗物，20世纪初在哲里木盟小库伦还收集到类似的完整陶鬲<sup>[6]</sup>。近年在西拉木伦河流域的考古调查中，在巴林右旗的呼特勒、查日斯台、和布特哈达和塔布敖包等地点也曾发现过领饰附加堆纹、或有珍珠纹和鸡冠状鏊的鬲类器物口沿残片<sup>[7]</sup>。在喜鹊沟遗址发掘期间，李延祥、陈建立与韩立新调查发现了黄岗梁上的伊和沃门特采矿遗址，采集到的陶片及石锤等采矿工具，特征与喜鹊沟遗

作者：王立新，长春市，130012，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付琳，福建省厦门市，361005，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图一 喜鹊沟类遗存陶器

1~4、6、8~12、17. 鬲（喜鹊沟F1②：20、喜鹊沟F1①：32、喜鹊沟F1②：21、喜鹊沟F1①：33、砚台山B2区H12：15、砚台山B2区H16：1、小库伦、小库伦、砚台山B2区H12：13、天宝同、砚台山B2区H16：2） 5. 盆（喜鹊沟F1①：29） 7. 罐（喜鹊沟F1①：31） 13. 甗（砚台山B2区T1①：15） 14. 尊形器（砚台山B2区F2：1） 15、16. 盅（砚台山B2区H15：1、6）

址出土遗存完全相同，应当是与喜鹊沟遗址地域毗邻且年代同时的另一处重要的采矿遗址。

这类遗存的陶器以夹砂灰褐陶为主，其次为夹砂红褐陶，另有极少量泥质陶。器表流行饰竖向、斜向或交叉绳纹，且存在先施绳纹再局部抹平的做法，极少见弦断绳纹。以陶鬲为主要炊器，另有少量陶甗。陶鬲以领、腹分界比较明显的高领鼓腹鬲为多，形体较宽胖，袋足较肥硕，均有附加的尖锥状实足跟。此类鬲的领部在绳纹之上常加饰一周附加堆纹，有的在领中部饰一周珍珠纹，或有对称鏊。也有少量领、腹无明显分界的筒腹鬲。领饰附加堆纹条带的鬲以往多被称为“花边鬲”。据韩嘉谷先生研究，此类风格的器物主要是在晚商时期伴随北方系青铜器而广布于中国北方的长城地带<sup>[8]</sup>。以往被划归魏营子类型的辽宁西部义县向阳岭遗址第三、四期遗存<sup>[9]</sup>和喀左后坟陶器群<sup>[10]</sup>

中均可见到领饰附加堆纹的高领鼓腹鬲，然而形体上均较赤峰地区上述遗址所见同类器瘦小，同时袋足也显瘦而浅，足跟形态多样，领部不见对称鏊，未见珍珠纹装饰。向阳岭遗址颇有特色的高领深弧腹鬲不见于赤峰地区。此外，向阳岭遗址第三、四期遗存和喀左后坟陶器群中流行夹砂红褐陶，器表素面或绳纹被抹去的比例更高。两地所见其他罐、钵类陶器的形制特征也有明显区别。鉴于现有的资料积累尚不充分，且已有迹象显示两地含“花边鬲”遗存存在明显区别，所以可暂将赤峰地区目前所见的以高领鼓腹花边鬲为代表的遗存称为喜鹊沟类遗存（图一）。目前来看，此类遗存的分布地域可能既包括赤峰地区北部的西拉木伦河流域，也包括南部的老哈河流域。

以往对科尔沁沙地东部至松辽分水岭两翼地带进行的考古调查中，也发现有一批陶器特征与之相近的遗存<sup>[11]</sup>。但由于缺乏发掘

资料，上述地区含“花边鬲”的遗存的性质是否与喜鹊沟类遗存相同，还有待今后的进一步工作来解决。但至少已有迹象表明，“花边鬲”正是沿这一地带继续向东传播的。

一般认为，“花边鬲”在辽西等地的出现始自晚商时期。喜鹊沟遗址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也主要在晚商积年范围之内，其下限或可至西周初。本次对喜鹊沟遗址的发掘，无疑证实了这类含“花边鬲”的遗存在晚商时期的西拉木伦河流域确有分布。喜鹊沟类遗存的发现与辨识，填补了本区内夏家店上层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间长达数百年的年代缺环，为我们探讨本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来源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也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花边鬲”向松嫩平原的传播过程提供了地域上的中间环节。

## 二、聚落特点与生计方式

从诸多方面来看，喜鹊沟遗址都是一处非常特殊的聚落。

首先，此处遗址的面积虽然可达12000平方米，但其位于基岩裸露的山脊之上。从地探部门所挖的十多条探矿槽的剖面可以明显看出，除遗址南部很小范围内存在文化层堆积和明显的居住遗存之外，绝大多数地段地表即可看到基岩或基岩风化形成的初育土。遗迹的类型以采矿形成的矿坑为主，地表所见的遗物也主要是采矿和加工矿石的石质工具。本次发掘发现的两处房址，均位于遗址南部山顶平台附近，地表可见的六处古矿坑中有五处即位于其周边很近的范围内，且F2打破F1，F2应为F1废弃后在其旁修建的。显然，在同一时间段内很可能只有一座房址在使用。F1的居住面上及灶内出土有石锤等采矿工具，F2的石墙空隙内也垒砌有残断的石锤，说明这两处房址都与采矿活动密切相关。从这两处房址的结构看，均为部分直接开凿在基岩之上，部分用石块垒砌，墙壁、地面均未见特殊加工，很像是临时使用

的简陋窝棚式建筑，应当就是采矿工人的临时住所。遗址地表发现的两道石墙（Q1、Q2）和一座石砌建筑（J1），用途不明，但从位置靠近房址和矿坑、石砌建筑（J1）的墙内也有垒砌进去的石锤且地表未见任何晚期遗物等迹象来看，很可能也与采矿活动相关，不像定居性聚落中的建筑物。遗迹内出土的工具中，采矿及加工矿石的工具占绝大多数，有少量狩猎工具，未见农具。出土的生活用器中，仅见陶鬲、陶盆和陶罐的残片。这样的工具和用器组合，说明聚落中的人群来到此地的目的就是为了采矿和加工矿石，并不从事专门的农业生产。

值得注意的是，F1面积虽然不大，但其居住面的不同位置共发现有三处坑式灶，灶内出土石锤、石块、烧灰、炭粒、经烧烤的兽骨、鱼骨和红烧土块。如果三处灶址同时使用，未免会使得室内空间变得十分拥挤，所以不排除它们是不同的时间段使用所遗留的可能。此外，F1堆积中还发现有四处明显的用火痕迹，其中也有经烧烤的兽骨、鱼骨和陶片。这四处残存的用火痕迹位于房内堆积的不同位置、不同深度，其间均存有不同厚度的堆积层。虽然从整体上很难将F1的房内堆积分层，但多处用火痕迹的存在，表明在堆积形成的过程中也不断有人来此活动，且每次活动之间均有一定的沉积物相隔。房址内出土的生活用器种类也很少。这些现象都反映出该聚落并非常年定居的村落，而最有可能的是季节性使用的聚落。

其次，从遗址周边的环境、气候、土壤、资源等方面来看，在当时的生产力状况下也很难满足维持人们长期生活和居住的需要。喜鹊沟遗址位于大兴安岭西南端迎风坡面的一处山脊上，西北接平坦宽阔的贡格尔草原，西南濒临浑善达克沙地。这一带虽然年均降雨量可达350~400毫米，但是气候冷凉，年平均气温仅有1℃~2℃。其中一月份平均气温在零下23℃~零下24℃，七

月份平均气温也仅有 $16^{\circ}\text{C} \sim 17^{\circ}\text{C}$ ，无霜期为60~100天，不适合普通农作物生长。遗址周边在克什克腾旗现今的气候区划中也被划入温凉寒半湿润牧业气温区。而且，从土壤分布情况看，遗址所在的达来诺日镇管辖范围内，山岗地带遍布基岩及由基岩风化形成的粗骨土和石质土，属初育土范畴，土体中砾石和岩石碎屑含量较多，肥力极低，难以利用。而草原、漫滩地带多属黄暗栗沙土或沙质暗栗钙土，还有沙壤质冲湖暗栗土、沙质冲湖暗栗土等土壤类型。这些土壤类型中的有机质含量也都很低，属于不适合开展农耕的土壤类型<sup>[12]</sup>。加之当地靠近浑善达克沙地边缘，风沙十分严重等原因，现今这一带仍只适合发展畜牧业而不宜农耕。遗址与最近的定居村落官地嘎查距离有8公里，距离最近的喜鹊沟牧站也有3公里，当地村民的收入至今仍主要依赖于畜牧业。

既然喜鹊沟遗址不属于定居的村落遗址，周围地区的环境因素又的确不适合农耕，那么，该聚落究竟是采用什么样的生计方式来维持铜矿开采活动呢？

动植物遗存的采集、鉴定和统计分析是研究聚落生计方式的重要手段。发掘期间通过分拣、筛选等手段对全部的哺乳动物骨骼和绝大多数鱼骨进行了系统收集，地层和遗迹内的堆积都收集了浮选土样。喜鹊沟遗址出土的哺乳动物骨骼标本总计429块，其中可鉴定属种的标本为217块，分属于四目七科至少10属10种，包括黄牛、绵羊、山羊、家马、家猪、家犬、马鹿、熊、鼯鼠和其他啮齿类动物，其中前六类属于人工驯养的动物，后四类属于野生动物。驯养动物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从肉食贡献率上看，以黄牛所占比例最高（近80%），绵羊、山羊、家马、家猪、家犬合计仅占14.5%，野生动物合计约占7%<sup>[13]</sup>。发掘中在F1、F2房内堆积及居住面上可见大量鱼骨，破碎化程度很高，可辨部位有鱼鳞、鱼刺、鱼鳃盖骨等，属种

难以鉴定，但大略可知鱼的体形较小，长度多不超过30厘米。由此可以推定，聚落内人群的肉食资源主要源于专人饲养的家畜和捕捞的鱼类，很少一部分则源于狩猎活动。需要说明的是，在土样浮选中，除木炭屑外，未发现任何古代植物的标本，这似乎表明植物类食物在人群食物构成中所占的比重可能十分有限。这样的食物来源构成，显然与遗址周边的自然环境特点十分契合。而且，从采矿活动的适宜期和大量捕鱼活动来看，人群在此活动的季节应当是在夏季前后。上述人工驯养的动物中，除家猪以外均是适应于草原环境的动物。可以想见，夏季牧草丰美之际，当驱赶足够数量的牛群、羊群进入草原，即使不依赖农耕，仍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维持采矿人群的生计。遗址西去贡格尔河仅约20公里，西南距岗更诺尔、达里湖也都在步行一日可往返的范围内。而这些水域至今仍盛产体形较小的鲫鱼与华子鱼。遗址往东即是绵延的大兴安岭山地，林木繁茂，至今仍有鹿、狍等野生动物出没。显然，这些野生的动物资源自然可以成为采矿人群肉食品的重要补充来源。

由于采矿活动需要一定的人员相互配合才能完成，除挖掘矿石、加工矿料、制作并修补工具外，还需有人放牧、渔猎并加工食物。所发现两处房址的面积均在20平方米以下，并不适合多人从事长时间、大量的室内活动。可以推测这两处房址的主要用途应当就是加工食物、修补工具，并在天气恶劣时提供暂时躲避的场所。

综上所述，喜鹊沟遗址显然不是普通的定居性村落，而应是一处季节性的以开采铜矿为目的的特殊聚落。采矿活动的季节应当就是牧草丰美的夏季前后，人们不仅可以从家养动物获得较为稳定的肉食和奶制品，还可以从事捕鱼和狩猎活动作为生计的重要补充。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生计方式与春秋中期以后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出现的游牧经济

有显而易见的相同之处，甚至很有可能就是季节性游牧生产方式起源的一种途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后者的季节性游牧已成常态化，且畜群构成中移动性较好的绵羊、山羊与马的比例明显升高，而牛的比例较少而已。

### 三、生产方式

喜鹊沟遗址此次发掘面积虽小，但收获颇丰，尤其是出土和采集到大量的采矿和加工矿石的工具。所发现的采矿工具主要有石锤、石钎和鹿角镐，加工矿石的工具主要有石球、石研磨器和石碾盘。本次试掘清理的矿坑K5底部即发现有采矿工具石锤2件、鹿角镐1件，K5坑口外的尾矿堆积中出土有获取矿砂的矿石加工工具石研磨器2件、石碾盘2件。在遗址地表采集到的石研磨器和石碾盘也多集中分布于K1~K3坑口外不远处的尾砂扇面上，表明当时加工并分选矿料的工作，是在采矿坑的外围就地进行的。

通过调查，在遗址及周邻大约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并未发现明显的冶炼遗迹，仅在遗址北部坡上采集到零星的炼渣。据冶金考古专家李延祥、陈建立教授现场初步判断，这很可能属于采矿过程中试炼矿石所留下的残渣。加之矿坑附近尾砂扇面上多见石研磨器、石碾盘的现象，可以推断当时所采矿石大多是被加工成矿砂，再通过畜力或人力输送到他地进行冶炼的。李延祥教授的研究业已表明，与喜鹊沟遗址同在赤峰地区北部、且年代稍晚的林西大井夏家店上层文化矿冶遗址的采矿规模也远大于其自身的冶炼规模<sup>[14]</sup>。通过近年的专项调查与检测，已证实是夏家店上层文化先民开采林西大井矿区的铜铅共生矿石，并运往邻近的巴林右旗塔布敦包等多个地点进行冶炼和铸造<sup>[15]</sup>。值得注意的是，大井遗址虽出土有数以千计的石锤，却至今未发现1件石碾盘，所以在该遗址就地冶炼和输出他地进行冶炼的，最

大可能就是采下的块状铜铅共生矿石。与此相比，晚商时期喜鹊沟遗址开采并加工出的矿砂，会最大限度地减轻运输的压力，自然可被输送到更远的地方进行冶炼。由此可见，晚商时期的喜鹊沟铜矿遗址与年代稍晚的林西大井夏家店上层文化铜矿址在生产方式上是有明显差异的。

当然，这种就地加工选取矿料并向外输送的生产方式，很可能与晚商时期土著人群在当地的定居点数量稀少、无法为专门的冶炼活动提供保障有关。虽然近年在赤峰地区已发现和辨识出来的晚商时期的遗址数量有所增加，但仍然是屈指可数，远不能与本地年代较早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年代较晚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遗址分布密度相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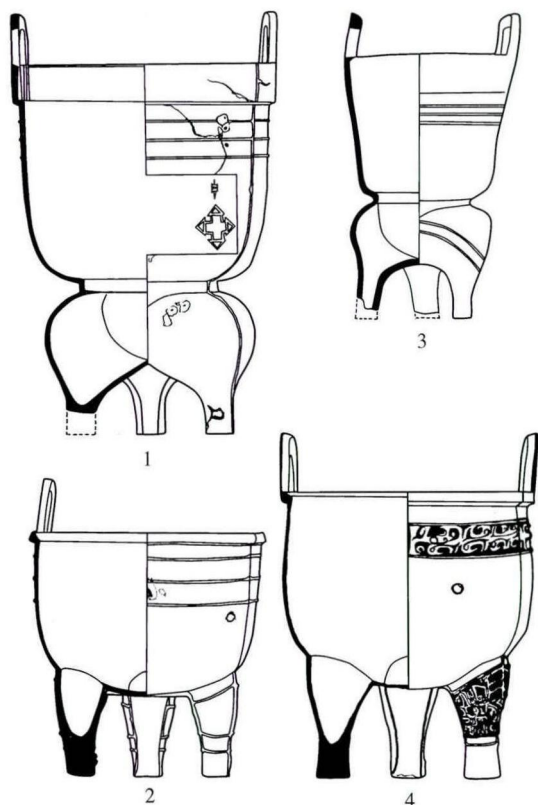
可见，作为一处季节性的采矿遗址，喜鹊沟遗址开采矿石和加工选取矿料的工作是同时进行的，出产的矿砂很可能主要是被输送到他地进行冶炼。而对于这些矿料去向的探索，将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辽西地区早期青铜文化的发展及与周邻地区尤其是中原地区的关系。

### 四、与辽西地区早期青铜文化的关系

辽西地区内年代约当中原夏至早商时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已有冶金业。常见的金属制品种类有青铜刀、锥、耳环、指环、杖首及斧钺的柄首和镞等，属于小件的工具或复合工具、兵器类的构件及装饰品<sup>[16]</sup>。大甸子墓地还发现过金耳环和锡杖首<sup>[17]</sup>。目前发现形体最大的1件青铜制品是锦西水手营子墓葬中出土的连柄铜戈<sup>[18]</sup>。发现的铸范很少。赤峰四分地东山嘴遗址出土有1件长3.4厘米的扁平椭圆形陶范，是合范的一扇<sup>[19]</sup>。北票康家屯遗址出土的1件石范两扇俱全<sup>[20]</sup>。所铸器形还都不曾见于已知的青铜器种类中。最近对辽宁建平庙台地和小北山两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进行复查时均发现了青铜冶铸的坩

坩残片和铜炼渣，其中有的坩残片还带有鼓风孔。鉴于小北山遗址地表发现的是单纯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物，坩残片的陶质及厚度等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同类器有别，可初步将这两处遗址冶铸遗迹的时代推定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不过，从庙台地和小北山遗址的调查来看，坩残片和炼渣都只集中发现于遗址中很小的范围之内，表明青铜冶铸生产的规模都不会很大，很可能属于某一家庭的行为<sup>[21]</sup>。但迄今为止，在辽西地区仍未发现明确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采矿遗址，这一时期是否已经出现铜矿开采，其生产方式如何，与喜鹊沟遗址的生产方式有何异同，这些都有待于今后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辽西地区发现的几批属于殷墟早期及稍早阶段的青铜鼎、甗十分引人注目。克什克腾旗天宝同<sup>[22]</sup>和赤峰市松山区西牛波罗<sup>[23]</sup>各出土弦纹甗1件，朝阳地区曾收集到弦纹鼎



图二 辽西地区出土殷墟早期青铜器  
1、3. 甗（头牌子、天宝同） 2、4. 鼎（头牌子）

1件<sup>[24]</sup>。1981年5月，翁牛特旗头牌子大队敖包山前出土铜甗1件、铜鼎2件，鼎中盛满了棕色结晶体矿砂<sup>[25]</sup>。这6件大型青铜鼎、甗时代特征明显，年代均不晚于殷墟第二期（图二）。其中，头牌子出土铜鼎内所盛矿砂的锡含量高达50%左右，据李延祥先生分析，其与喜鹊沟及邻近的伊和沃门特遗址出产的矿石成分相同<sup>[26]</sup>。克什克腾旗天宝同铜甗出土地点附近还采集到喜鹊沟类遗存的陶片，也说明这些青铜容器很可能与喜鹊沟类遗存密切相关。这些中原风格青铜容器及矿砂的发现表明，喜鹊沟这类遗址出产的矿砂应当就与中原商王朝对辽西地区矿产资源的需 求有关。而且，如果将这些发现的地点相连接，已可明显看出一条由克什克腾旗出发，经翁牛特旗、赤峰松山区，向更南的辽宁朝阳延伸的交通路线。

苏赫先生曾指出，头牌子遗址所出铜鼎、甗及西牛波罗遗址所出的甗，在制作特点上与中原有所不同，可能是本地产品<sup>[27]</sup>。杨建华先生认为，这些中原风格的青铜容器以鼎、甗等器类为主，说明了当地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影响是有选择地吸收。杨先生同时还认为，这样一种能够铸造青铜器的考古学文化还有待今后这一地区的发现。应当注意的是，与天宝同铜甗同时发现的零星陶片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线索<sup>[28]</sup>。通过此次对喜鹊沟遗址的发掘，我们对喜鹊沟类遗存的文化内涵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已可说明，该类遗存所代表的晚商时期土著人群已经具备了开采矿石、加工选取矿料的能力，并很可能掌握了冶铸大型青铜容器的技术。

辽西地区拥有丰富的铜、锡等金属资源。西拉木伦河以北至乌兰浩特洮儿河以南的大兴安岭南段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的地区，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稀有金属和铜锡多金属成矿集中区。该成矿区的南部，即西拉木伦河断裂带北面，已划分出黄岗梁—浩布高锡铜银成矿带和敖尔盖—好来宝铜金多金属

成矿带<sup>[29]</sup>。其中黄岗梁—浩布高锡多金属成矿带是长江以北已知最大的锡矿带，地质学上称为锡的“燕辽成矿带”<sup>[30]</sup>。

可以想见，晚商时期喜鹊沟一类遗址出产的铜锡砷铅共生矿矿料，特别是其中富含的锡料，无论对商王朝还是对其他具备铸造大型青铜器能力的地方势力来说，都是极其珍贵的资源。从现代地矿资料来看，黄河中下游地区出产铜、铅，但至今未发现锡矿资源。闻广先生曾力图从文献中寻找证据，以期证明夏、商、周王朝冶铸青铜器所用的锡料主要产自本地<sup>[31]</sup>。但基于相同的史料，童恩正先生等则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即认为中国青铜时代主要的锡矿产地在我国南方<sup>[32]</sup>。金正耀先生认为：“如果中原地区确实无锡，则晚商大规模锡青铜铸造的锡料可以肯定是来自其他地区；反之，即使今后探明存在有锡矿床，则在古代是否已被开采利用，还需要考察。许多矿藏，因为埋藏较深，其探矿和开采的困难，都只有在现代技术的条件下才可能被克服”<sup>[33]</sup>。

鉴于喜鹊沟晚商时期采矿遗址向外输出矿料的生产模式和辽西地区商代大型青铜鼎、甗的频繁发现，我们有理由做出这样的推测：喜鹊沟遗址出产的矿料至少应有一部分是向商王朝或其他具备铸造大型青铜器能力的方国输出，至于是通过交换还是贡赋的手段来实现，还需寻找进一步的证据。太行山东麓的低山丘陵和山前平原地带是商代连接中原与北方的重要通道，房山塔照（二期）、易县七里庄（三期）、涑水炭山等遗存均反映出使用“花边鬲”的人群在晚商时期的活动范围和能力<sup>[34]</sup>，故而辽西地区与商王朝之间所存在的青铜容器和矿砂之间的辗转流通并非没有可能。更为重要的是，随着长期的交往和文化交流，土著人群也有可能掌握铸造大型青铜容器的技术，并且成功地仿制中原风格的青铜鼎、甗。由于这些大型青铜容器并不方便携带，一旦面临战乱需要

逃亡时，便出现了用于藏匿青铜重器及其铸造原料的窖藏。另外，喜鹊沟一类采矿遗址的发现，也为本地区晚商时期常见的青铜武器、工具找到了矿料的来源。

西周时期，辽西地区的青铜文化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努鲁儿虎山以东以喀左为中心的地带有数批大型青铜器出土，其青铜器的来源和文化归属虽不同于前述几批晚商铜器遗存，但重要的是其中已不乏形制上颇具地方特色的青铜容器。努鲁儿虎山以西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更创造出了如小黑石沟所发现的有地方特色的青铜容器群<sup>[35]</sup>。可见，喜鹊沟类遗存对辽西地区青铜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颇为深远的影响，其承上启下的作用显而易见。

## 五、余 论

我们将视野拓宽一些则不难发现，晚商时期商文化周边地区大型青铜器集中发现的区域，无一不是铜矿、锡矿等重要矿产资源富集并且开采较早的地区。商王室和贵族们为冶铸青铜器，无疑需要大量的铜、锡资源，其获取的方式无非是控制矿区、武力掠夺或贸易交换。早商时期，盘龙城商城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商王朝要控制长江中游地区丰富的铜、锡资源。晚商时期，虽然盘龙城商城遭到废弃，商文化范围向北收缩，但晚商文化创造的青铜文明却步入巅峰，大量精美绝伦的殷墟式青铜器显示出商人的矿料来源之路并没有随着盘龙城商城的废弃而告绝闭。这或许说明，此时的商王室和贵族们可能调整了获取铜、锡资源的方式与策略。大量的铜、锡矿料可以通过贸易或贡赋等途径从矿产富集地区的土著群体手中流入到商文化的中心区。通往大兴安岭南端喜鹊沟等铜锡矿产地的道路上之所以会频频发现中原风格的青铜重器，其原因亦当如是观之。

当然，只有依靠对商代矿冶遗址的科学

发掘,以及对商文化中心区出土青铜器进行全面的科学检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商文化青铜器铜、锡料来源的问题。仅就目前的资料来看,晚商时期中原地区所需的铜、锡矿料至少应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大家过于关注的长江中游以外的地区。其中,辽西地区北部的喜鹊沟一类采矿遗址是不能忽视的。

附记:该文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研究成果(2009JJD780004)。

### 注 释

- [1]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喜鹊沟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4年第9期。后文凡未另注出处的喜鹊沟遗址资料均出于此简报。
- [2] 赤峰市博物馆:《砚台山遗址(B2区)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2009年第2期。
- [3]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文物工作组:《内蒙古自治区发现的细石器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 [4] 克什克腾旗文化馆:《辽宁克什克腾旗天宝同发现商代铜甗》,《考古》1977年第5期。
- [5] 巴林右旗博物馆:《巴林右旗古日古勒台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2年第1、2合期。
- [6] 日本东亚考古学会:《貔子窝——南满洲碧流河畔の先史时代遗迹》第48、49页插图22,《东方考古学丛刊》甲种第一册,1929年。
- [7]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西拉木伦河流域先秦时期遗址调查与试掘》,科学出版社,2010年。
- [8] 韩嘉谷:《花边鬲寻踪——谈我国北方长城文化带的形成》,见《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
- [9]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义县向阳岭青铜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13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 [10] 喀左县文化馆:《记辽宁喀左县后坟村发现的一组陶器》,《考古》1982年第1期。
- [11] a.李甸甫、朱声显:《科尔沁右翼中旗呼林河沿岸原始文化遗存》,《文物资料丛刊(7)》,文物出版社,1983年。
- b.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内蒙古扎鲁特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旗香山镇双龙泉与水泉沟遗址的调查》,《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3期。
- c.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库伦旗查干朝鲁台遗址的调查与初步认识》,见《边疆考古研究》第10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
- d.朱永刚、张哈斯、温景山:《科左中旗白菜营子遗址复查与遗存试析》,《内蒙古文物考古》2010年第2期。
- e.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敖恩套布和西固仁茫哈遗址复查与遗存辨析》,见《边疆考古研究》第9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
- f.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通榆县三处史前遗址调查与遗存分类》,见《边疆考古研究》第7辑,科学出版社,2008年。
- g.吉林省文化厅、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通榆县长坨子四处遗址的调查》,《北方文物》2011年第3期。
- h.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洮南四海泡子四处遗址调查与初步认识》,见《边疆考古研究》第9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
- [12] 克什克腾旗编纂委员会:《克什克腾旗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 [13] 汤卓炜、王立新、李东杰、刘玮:《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喜鹊沟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的鉴定与初步分析》,《考古》2014年第9期。
- [14] 李延祥、韩汝玢:《林西大井古铜矿冶遗址冶炼技术及产品特征初探》,见《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科学出版社,2002年。
- [15] 李延祥、董利军、陈建立、朱延平:《塔布敖包冶铜遗址再探》,见《边疆考古研究》第12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
- [16] Wang Lixin, 2013. The Lower Xiajiadian Culture of the Western Liao River Drainage. *A Companion to Chinese Archaeology*, Chapter 23, Wiley Blackwell Press.
-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第188~191页,科学出版社,1998年。
- [18] 齐亚珍、刘素华:《锦县水手营子早期青铜时代墓葬》,《辽海文物学刊》1991年第1期。



- [19] 辽宁省博物馆、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赤峰县文化馆：《内蒙古赤峰县四分地东山咀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5期。
- [20]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北票市康家屯城址发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8期。
- [21] 资料将另文刊布。
- [22] 同[4]。
- [23] 刘冰：《赤峰博物馆文物典藏》第36页，远方出版社，2006年。
- [24]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概述辽宁省考古新收获》，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 [25] 苏赫：《从昭盟发现的大型青铜器试论北方的早期青铜文明》，《内蒙古文物考古》1982年第2期。
- [26] 承李延祥教授见告。
- [27] 同[25]。
- [28] 杨建华：《燕山南北商周之际青铜器遗存的分群研究》，《考古学报》2002年第2期。
- [29] 肖成东、杨志达：《内蒙赤峰北部两个重要的成矿带及其成矿特征》，《有色金属矿产与勘查》第4期第6卷，1997年。
- [30] 芮宗瑶、施林道、方如恒：《华北陆块北缘及邻区有色金属矿床地质》第20页，地质出版社，1994年。
- [31] 闻广：《中原找锡论》，《中国地质》1983年第1期；《中国古代青铜与锡矿》，《地质评论》1980年第4、5期。
- [32] 童恩正、魏启鹏、范勇：《〈中原找锡论〉质疑》，《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
- [33] 金正耀：《晚商中原青铜的矿料来源研究》，见《科学史论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87年。
- [34] 段宏振：《太行山脉东西两翼：中原与北方青铜文化互动的重要通道》，见《三代考古（三）》，科学出版社，2009年。
- [35]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城县辽中京博物馆：《小黑石沟——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9年。

（责任编辑 苗霞）

## ○信息与交流

### 《新泰出土田齐陶文》简介

《新泰出土田齐陶文》由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山东博物馆、新泰市博物馆编著，文物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本书为16开精装本，有正文34万字，文后有彩色图版56版，定价260元。

近年来，山东省新泰市城区内陆续发掘大量春秋战国时期遗存，其中有陶文或刻符陶片700多件，这些均为春秋末年到战国

时期的田齐陶文。这是目前发现的田齐陶文数量最多的一批，而且官营“立事”陶文和民营非“立事”陶文齐全。像这样全面、系统、科学的资料在田齐陶文中是首次发现，这不仅对古代史、地理沿革、度量衡制度、古文字研究，而且对工官制度、姓氏制度等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肖玫）

## 本期要览

**河南禹州市前后屯遗址龙山文化遗存发掘简报** 2010年,山东大学考古与博物馆学系对河南省禹州市前屯村北的前后屯遗址进行了发掘,其中的龙山文化遗迹有房址、灰坑、沟和墓葬,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角器和蚌器等。本次发掘的龙山文化遗存属龙山文化早期阶段,为研究中原地区龙山时期的社会复杂化进程提供了一批重要的资料。

**成都市新都区高家院子商周遗存的发掘** 2010年7月至2011年3月,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成都市新都区高家院子遗址进行了发掘,遗址中商周时期的遗迹有灰坑和灰沟。出土遗物有陶器和石器,陶器有罐、瓮、壶、豆、盃、器盖等,石器有斧、镑、凿、刀、圭形器等。从出土遗物特征推断遗址的时代应属于十二桥文化早段,大致在殷商第三、四期。

**云南陆良县薛官堡墓地发掘简报** 2012年和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对云南陆良县薛官堡墓地进行了发掘,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随葬品有铜器、铁器、陶器、玉石器、玻璃器、漆木器、钱币和铜镜等。墓葬的主体年代应在西汉时期,文化面貌有较强烈的地方特色,因此判断该墓地为西南夷某地方部族的公共墓地。

**成都平原先秦聚落变迁分析** 根据对成都平原先秦聚落的分布、聚落的密度与规模以及聚落的结构分析,并结合考古学、环境、生业等对聚落变迁动因所作的初步推测与解释,可以认为成都平原史前人群最初是从岷江上游迁徙下来的,并随着对成都平原环境的适应逐步向平原腹心地区移动。岷江冲积扇未发现三星堆文化聚落可能与洪水有关。

**论克什克腾旗喜鹊沟铜矿遗址及相关问题** 喜鹊沟遗址是目前我国长江以北地区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铜矿遗址。从周边环境、地形地貌以及遗迹形态分析,喜鹊沟遗址是一处为配合采矿活动而存在的季节性遗址,居住者的食物来源主要依靠畜牧和渔猎。这一采矿遗址的发现,为探索中原地区晚商时期铜、锡矿料的来源提供了新的重要线索。